

分析探讨

定位华裔新西兰人：当代“高质量移民”与 早年“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之比较^{*}

叶宋曼瑛¹ 著，程东金² 译

(1 奥克兰大学 亚洲研究系，新西兰；2 北京大学 历史系，北京 100871)

[关键词] 新西兰；国际移民；新移民；华裔新西兰人；华人性

[摘要] 自19世纪至20世纪中期，华裔新西兰人被视为不被法律承认的异乡人；而从1987年开始，华裔新西兰人被视为主要的中产阶级移民群体而受到欢迎，并被寄予建立国际联系和裨益经济的厚望。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如社会经济实力、籍贯、教育程度、移民动机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最主要的是，他们与新西兰非华裔主流群体的融合程度不同。然而，不论是早期卑微的定居者还是近年来的高素质“空中飞人”，华裔新西兰人的定位没有改变，只要他们是华人的后代，而且“看起来是华人”，他们就永远不可能被当作“真正的新西兰人”。“华人性”总是被刻画成和“新西兰价值”格格不入。

[中图分类号] D634.3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09)03-018-08

Locating Chinese New Zealanders: Comparing Contemporary 'Quality Migrants' with the 'Undesirable Aliens' of Yesteryears

Manying Ip¹, Trans. by CHENG Dong jin²

(1. School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Auckland, New Zealand;

2. Department of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Key words: New Zealand; international migrants; new migrants; Chinese New Zealanders; Chineseness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position of the Chinese New Zealanders, first as a barely tolerated alien group to be legislated out (from the 19th to the mid 20th centuries), and then as a largely middle-class immigrant group to be welcomed in the hope of forging international linkages and benefiting the economy (from 1987 onward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groups exist: in terms of socioeconomic power, provincial origins, educational levels, migration motivations,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ir pattern of engagement with the non-Chinese majority population in New Zealand. However, one strand ultimately linking these two periods is how mainstream New Zealanders view and treat Chinese New Zealanders. As long as they

[收稿日期] 2008 12 08

[作者简介] 叶宋曼瑛，女，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新西兰华人、亚洲移民、跨国主义、种族主义及多元文化主义。

[译者简介] 程东金，男，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 原文系作者2008年向新加坡华裔馆提交的论文。

are ethnically Chinese and ‘look Chinese’, they were never treated quite like ‘real New Zealanders’. “Chineseness” has unfortunately been paraphrased 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New Zealand Value” in local society.

本文分析华裔新西兰人的地位。自 19 世纪至 20 世纪中期, 他们几乎被视为不被法律承认的异乡人; 而从 1987 年开始, 他们才被视为主要的中产阶级移民群体而受到欢迎, 并被寄予建立国际联系和裨益经济的厚望。在上述两个群体之间, 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如社会经济实力、籍贯、教育程度、移民动机, 最重要的是, 他们与新西兰非华裔主流群体的融合程度不同。然而, 将这两个群体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线索是新西兰主流社会如何看待华裔新西兰人。^[1] 无论是贫穷还是富裕, 无论是文盲还是受过良好教育, 无论是本地出生的第五代移民还是刚刚到达新西兰, 只要他们是华人的后代, 而且“看起来是华人”, 他们就永远不可能被当作“真正的新西兰人”。

新西兰人眼中的中国和华人

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 在大多数新西兰人眼里, 即使是那些见识不凡、富有教养的阶层, 中国都还是一个遥远的、充满异国情调的所在。^[2]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 “远东”这一来自英国的说法被广泛地用来指称中国、日本和韩国。从地理位置上看, 这个词是很不准确的, 因为新西兰实际上比这些亚洲国家更靠东部。

与中国相联系的异国情调是一个心理上建构“他者”的过程。尽管华人社区在新西兰已经有漫长的历史(自 19 世纪中叶起), 但新西兰至今仍未接受华人是真正的新西兰人。虽然如今来自中国特大城市的高质量移民和 19 世纪中叶来自珠江三角洲的卑微农民存在着云壤之别, 但中国人一直而且仍然被视为“移民”, 实际上是“外国人”。^[3] 新西兰在毛利人到来之前是无人居住的, 就此而言, 这里的每个人都应该算移民。然而, 新西兰的白人殖民者从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来自英国的移民被视为亲友, 而华人被认为是“不可同化的”, 因而是“不受欢迎的”: 他们是一个百合般洁白的国家中的黄色斑点。^[4] 各种苛

刻严格的法律将他们的人数一直控制得很低, 华人社区被隔绝和边缘化。后殖民政府继续保持了大多数白人至上的法律, 尽管当地出生的华人大部分已经被同化, 而且获得了这个国家“模范少数族群”的殊荣。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新到的华人移民导致了新西兰华人社区的剧烈变化。^[5] 与 19 世纪相比, 21 世纪的华人形象发生了空前的变化, 但绝大多数的主流新西兰人未必对不成文的白人政策进行反思, 因此, 他们普遍对中国新移民的到来感到异常惊讶, 因为这些人与他们所熟悉的温顺、低调、讲英语的当地出生的华人太不一样了。

最初, 大众媒体把注意力集中在来自香港、台湾等地的商业移民上, 批评他们光鲜的跑车、“怪诞的房屋”和其他“非新西兰”行为。^[6] 然而, 自 2000 年以来, 国际学生所带来的麻烦和“亚洲犯罪”开始引起了更多的注意。每一次的负面报道都会把问题视为“华人问题”和“亚洲移民问题”, 而不是将它们看作一般的新西兰社会问题。这些报道往往是偏激和误导的。

2006 年的人口

根据 2006 年最新的人口普查, 在新西兰的华裔总人数约为 15 万人, 占新西兰全国人口的 3% 左右, 是最大的非欧洲、非波利尼西亚少数族群。在华人中, 只有五分之一是本地出生的 (21.76%), 剩下近五分之四是移民。其中最大的群体来自中国大陆 (52.3%), 其次分别是中国台湾 (7.2%)、马来西亚 (6.6%)、中国香港 (4.5%)、新加坡 (1.7%) 及其他国家和地区 (5.8%)。

在华人移民中, 最大的群体 (43%) 是最到达新西兰、定居 4 年以下的移民, 另外 23% 则在这个国家居留最多 9 年。华人移民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初来乍到, 这显然对其社会凝聚力构成了一个挑战。不熟悉东道国语言和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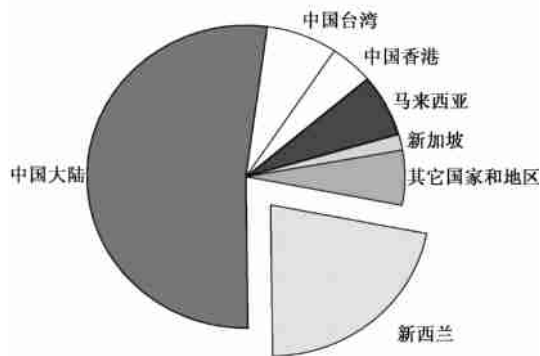


图1 2006年新西兰华人常住人口出生地

资料来源：新西兰统计局未发表的数据。

化的新移民容易像疼痛的拇指一样竖起，从而常常引起反移民的冲突。

旧的反华限制与“色盲”的新移民政策

由于新西兰与中国相距遥远且地理位置偏僻，因此政府的移民政策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影响新西兰华人数量、性质、组成和规模的最重要因素。新西兰与其他亚洲国家没有共同边界，危险的海洋意味着偷渡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19世纪，新西兰的移民政策旨在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南海英国”。因此在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华人或任何其他非白人移民都被视为不受欢迎者。^[7]当华人被允许进入时，他们只能作为旅居者，新西兰人期望当华人的劳动不再必要时，他们将会离开这个国家。^[8]

奥塔戈（Otago）金矿吸引了第一批有组织的华人移民工人。当欧洲开矿者因为新发现的西海岸金矿而离开奥塔戈时，达尼丁商会（Dunedin Chamber of Commerce）招募了华人移民。选择中国人有着特殊的原因：他们被认为是勤劳、无害、愿意继续在被废弃的金矿进行工作的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情愿最终返回自己的家园。1866年，第一批12名华工由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来到新西兰。到1869年底，2000多名华工已经来到这块后来被称作“新金山”的土地。

1871年，已经出现了要求限制华人移民的呼声。像其他英国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一样，新西兰向华人移民征收入境税。1881年，《华人移民法案》提出了10英镑的“人头

税”。该法案还对船舶的乘客实行了限制——每10吨载量只允许搭乘1名中国乘客。1896年，该比例降低到每200吨载量搭乘1名乘客，而人头税更是增加到100英镑。^[9]

在一长串排华法案中，人头税是最臭名昭著的。那些排华措施包括：

(1) 1907年后所有来到新西兰的华人都必须参加英语阅读测试；

(2) 从1908年起，禁止华人加入新西兰国籍，这一禁令直到1951年才取消；

(3) 从1908年起，需要暂时离开新西兰的华人都必须获得重新入境许可证，且许可证上必须按手印；

(4) 从1920年起，必须获得允许才能进入新西兰，这严重限制了中国移民的数量；

(5) 从1926年起，华人不能获得永久居住权；

(6) 至1936年前，华人的养老金一直是被剥夺的。

华人抗议这些不公正现象，向国会吁请公正待遇和法律改革。但他们的呼声都被忽视了。上述立法严重影响了华人社区的发展规模，使华人社区被孤立和边缘化，沉寂无声。^[10]

1987年，自由移民政策通过。这是第四届工党政府“反冲经济”（kickstart the economy）的最后得力措施。^[11]此前，新西兰经济由于不能及时适应变化的世界市场，已经陷入了停滞。巨大的人口外流已经持续了十年。^[12]

这项公正的移民立法推翻了新西兰长久以来更愿意接受英国和爱尔兰移民的偏好。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只要符合有关教育、职业、商业、年龄和财产资格的严格规定，任何人都能够获得居留签证。符合条件的华人，现在也可以大批进入新西兰了。由此带来的人口改变相当明显，以至于20世纪90年代被描述成移民“潮水般涌入的年代”。^[13]

卑微的早期定居者与最近的 高素质“空中飞人”

19世纪中期，华工被视为“苦力”。人们认为他们“无知、有奴性、奸诈”，将会侵扰新西兰，使这个白人国家退化。早期的华人移

民来自广东省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部分(67%)来自番禺县,其余的来自四邑、增城、东莞和中山。这些县都位于广州附近。

大部分早期华人都是淘金的矿工。在20世纪前十年间,当大部分黄金开采殆尽时,他们涌进达尼丁、惠灵顿、奥克兰等城市周边新出现的小镇。与在美国、澳大利亚的华人一样,他们占据了手工洗衣这样一些不体面的领域。新西兰肥沃的未开垦地为他们从事蔬菜种植提供了机会。这一行业劳动太密集,很难吸引白人定居者——他们宁愿在农场里饲养牛羊。华人菜贩很快就生产出各城市所需的大部分绿色蔬菜。他们大多从事低贱的服务业,和新西兰主流社会几乎没有联系。

如前所述,1987年之后的华人移民与早期的华人移民先驱完全不同。他们能获准进入新西兰,因为他们大多数是中产阶级。他们通常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员或拥有国际沟通能力的商人。这些新移民抱着不同目的迁往新西兰。他们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于那些广东先驱,他们大部分人来自中国内地或海外的发达都市。许多人来自中国的沿海大城市;一些人来自香港、台湾或者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再移民”。那些来自香港的移民,是出于“不情愿的逃离”,因为他们对1997年后中国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景忧心忡忡;^[14]许多从台湾来的移民,则是担心大陆攻击台湾;^[15]大陆移民通常是为了寻求更好的机会。^[16]许多华人选择来此地,是因为他们想在一个竞争相对低的教育环境里抚养孩子,或者是因为他们想寻求一个更为轻松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就业机会。

与早期华人移民是为了逃避家乡悲惨的境地相反,当代华人选择移民是为了寻找更好的机会。由于英语技能是新移民标准的一项基本要求,大部分华人移民的英语程度都相当不错。今天,华人社区是受教育程度最好的少数民族之一。

其结果就是引人注目的语言变迁。早期华人移民一般说粤语,新移民则大部分说普通话。大部分早期华人基本不懂英语,而绝大部分新移民都能掌握英语以及其他国际语言。事实上,最新的人口普查表明,亚洲新移民掌握

多种语言的水平要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收入和就业

总的来说,今天的新西兰华人很有成就,拥有不俗的技能和可观的积蓄。然而,尽管当地出生的华人和华人移民都受过很好的教育,但他们的收入水平和劳动就业状况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进一步的考察发现,当地出生的华人就业和收入都处于高端,但因为一些新移民表现不佳,总体上的“华人形象”大打折扣。

为数众多的新移民没有就业,这部分是由于他们的海外资历得不到承认,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当地人的偏见。若干社会学调查发现,外国名字,尤其是华人名字,是求职过程中相当不利的因素。甚至在华人求职者的简历送到未来的雇主手里之前,对求职者的歧视就已经发生在职业中介机构内了。^[17]无论现在还是过去,华人来到新西兰都是为了寻求更好的机会。但是对许多人来说,这些机会根本就是可望不可及的。

这些新移民并没有预料到会遭遇就业市场上的困难。他们相信,既然他们在教育背景和履历上的强有力表现能通过移民资格审查,这些能力也一定会对未来的雇主产生吸引力。当找不到令人满意的工作时,他们成为“回归移民”,在其他繁荣的亚洲市场挣钱养家。^[18]他们会定期坐通勤飞机,回到新西兰的家里。他们经常飞来飞去,媒体把他们称为“空中飞人”。由于多数时间不在新西兰,他们是否愿意融入这个国家,也令人产生了疑问。^[19]这种跨国主义已经引发了公众误解,每回大选期间,都会有民粹主义政客借此大做文章。

新老华人社会的年龄—性别比例

上文提及的“空中飞人”现象经常会导致家庭关系的紧张,它也彻底改变了华人社区男性占据优势的局面。

尽管大部分早期华人移民男性已婚,但他们的妻子要留在国内的家里照看公婆。华人妇女很少移民新西兰,整个华人社区的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例如,在1881年,仅有9名华人女性,而男性则是4995人——直到二战前,

这一数字都是华人人口的峰值。^[20]

早期新西兰华人社区严重扭曲的性别比例显示出局面有多么严重。几乎没有华人矿工发财致富。在这个陌生的国度，大部分华人被迫一直处于单身、贫困和进退两难的状态。华人是在赊票制下得以移民的。一位担保人——通常是一位亲戚、同村的长者或者未来的雇主，提前支付船票和人头税。一个华工一般要花好几年时间，才能偿清这笔债务。

当早期华人涌进城镇和市区，开设水果店、洗衣店和小商店栖身落脚时，他们也发现蔬菜种植是一个机会，尤其在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华人往往从毛利人那里租来土地，和他们一起劳作，维持温饱。^[21]

直到二战以前，新西兰的华人社区都是男性占优势。因为大部分华人无力为自己的妻子支付 100 磅人头税，这笔钱够他们每隔几年探一次亲。后来，许多人又尝试着把自己的儿子、兄弟和侄子带进来，特别是在他们的菜园或店铺需要人手帮忙的时候。一些人则娶了欧洲人或者毛利人妇女。主流社会并不欣赏跨种族婚姻，惟恐蔓延开的跨种族婚姻会带来“混合民族”的结果。

1939 年之后，华人男子的妻子和孩子被允许以难民身份短期进入新西兰。当时的中国正饱受战火摧残。但这并非标志着移民政策的根本改变，1947 年通过的更加自由的定居条款，是出于对发生在中国的可怕灾难的人道主义关切。被授予永久居留权的包括在 1939 年之后以难民身份进入新西兰的妻子和孩子、这些妻子在新西兰出生的孩子、当时在新西兰居留超过五年的中国临时居民和学生。这些华人数不多，总共 1323 人。

这只是一场巨变的序幕。共产主义在中国大陆的胜利以及新西兰华人意识到不再有可能回归祖国，加速了这一进程。从那时起，一个由完整的家庭构成的真正的华人社区才落地生根。

从 1987 年以来，华人社区的性别比例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1991 年人口普查，男女比例第一次取得平衡。随后，华人女性的数量迅速增加，远远超过男性，尤其是中年人群

体。女性占优势，这在香港和台湾出生的移民群体中格外明显。大众媒体称之为“空中飞人现象”。因为挣工资的男人要在移民来源地和东道国之间，经常乘坐飞机通勤，而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留在新西兰当地。^[22] 大众媒体由此批评华人，认为他们搞福利欺诈，仅仅享受新西兰的教育福利，却不用履行公民纳税的义务。在选举的年份，华人新移民中的“空中飞人”行为招致了大量攻击。一些政客把反移民作为自己的政治纲领。

变动不居的社会

新西兰华人社区经历了显著的变迁。当它是一个由漂泊不定的男性组成的单身汉社会时，许多华人在鸦片和赌博中寻求慰藉。一些地区，比如惠灵顿的海宁街，因此变得臭名昭著。^[23] 二战期间及之后，随着家眷的到来，情况有了很大改观。华人妇女和孩子被允许以难民身份入境，开始是临时逗留，后来是长期居住。华人社会开始生根。凭借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辛勤劳动，中等规模的家庭事业（洗衣店、菜园、水果店）慢慢繁荣起来。

到 20 世纪 60 年代，许多华人后裔成为成功的专业人士。小而联系紧密的华人社区以新西兰的“模范少数族群”著称。在人们心目中，华人儿童通常成绩优异，他们的父母则工作努力勤奋。在各项统计中，华人社区的负面指标很低，而正面指标则很高。然而，华人社区在社会经济地位提高的同时，也迅速失去了原有的“华人性”。最明显的表现是母语的丧失，英语越来越成为主要的交流语言，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中。^[24] 到 20 世纪 70 年代，华人社团聚会已经偏好讲英语。华人社区看上去被完全同化了。

到 20 世纪 90 年代，来自不同国家的新移民完全改变了这一社会趋势。新的华人移民的进入，带来了华人语言和风俗的复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已经差不多被人遗忘的传统中国节日，比如春节和中秋节，又强劲地复活了。同时教授普通话和粤语的华文学校也建立起来，很受新移民子女欢迎。^[25]

正如笔者在文章一开始讲到的，过去华裔新西兰人实际上被新西兰主流社会视为外来者，在最近几十年里，尽管有更加公平的移民政策和反歧视立法（比如1993年《人权条例》规定，任何人不得因为种族、宗教和肤色而遭受不利），但“他者”的意识并没有真正发生改变。

反华宣传导致的最为悲惨的后果之一发生在1905年。Joe Kum Yung，一个年事已高的前华人矿工，被人杀死在惠灵顿海宁街。凶手Lionel Terry想要借此引起公众注意所谓的华人移民的危险。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诸如反华协会、反华联盟、反亚洲联盟和白人新西兰联盟这样的组织，掀起了排华运动。这些组织最初在华人聚集的矿区和蔬菜市场区开展活动，但很快就扩展到全国。在经济萧条的岁月，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退伍军人安置机构对来自“亚裔”的工作竞争异常警惕。^[26]

最近几十年里，华人移民问题成为极右翼反移民政党方便的政治幌子。新西兰每隔几年就举行一次大选（每三年一次），反亚裔民粹主义浪潮便借此周期性地发作。反华情绪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1993年是反“支票簿移民”，这由商业移民政策引发；1996到1999年间，口号是“根除移民”“行动起来，反对亚洲人犯罪”；2002年的焦点是“亚洲人如何改变了新西兰的种族构成”；2005年则是“新西兰是新西兰人的”。不管口号如何变化，核心却始终简单如一：华人等同于移民和外国人。“华人性”总是被刻画成和“新西兰价值”格格不入。因此，所有的华裔新西兰人，包括长期定居者，甚至那些当地出身者，都被界定为外国人。

针对华人的政策

理论上，一个现代民主国家应该平等对待所有国民，而不管他们的种族、文化和宗教为何。所有“可能的国民”，也就是说，哪怕是移民，都应获得一体对待。因此，华人应当和其他种族的公民一样，受到平等对待，而不应当有任何针对特定族群的单独政策。

1987年的移民政策宣布实行开放平等的选择政策。新政策完全依据申请者的个人能力，测定项目包括受教育程度、商业记录、健康和年龄。实际上，英语条款多年来一直被用作反对那些母语非英语的人的障碍，而华人移民一直是受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就人数而论）。

英语的流利水平，由公开考试的雅思成绩加以评定。新西兰移民局已经多次调整并提高了这一成绩，因为他们发现有太多的华人申请者。多达2万新西兰元的英语保证金也征收了多年。直到本文写作时，英语流利水平仍然作为申请者必须达到的一个标准。^[27]

新西兰政府也采取了一些积极步骤。2002年，它就人头税向华人社区正式道歉。这是实施此类行动的第一个国家。克拉克首相代表工党政府宣布，向那些因人头税立法和所有其他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法案而遭受家庭离散和其他痛苦的华人家庭进行历史性道歉。“我们相信，要想完全终结我们国家历史上这（黑暗的）一章，这种和解法案是必需的。”

官方道歉给华裔新西兰人带来了新的承认，也让他们倍感骄傲。但它并不包括任何金钱补偿。早在道歉很久之前的1944年，人头税就已取消。然而，因为华人是唯一需要缴纳人头税的种族集团，当过去的错误被公开承认时，它确实让所有的华裔新西兰人欢欣鼓舞，而不仅仅是那些祖先缴纳过人头税的华人。一个新近移民的马来西亚人说：“……我看到了，听到了克拉克的道歉……尽管我的家族没有人缴纳过人头税，我还是禁不住哭了。我们的政府最终承认了错误，而且道了歉。它做得很棒。虽然这道歉花了一百年。这是积极的一步。我尤其骄傲的是，我们的小小国家是第一个道歉的……来弥补它曾经犯下的错误。让我们希望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加入这个道歉的行列吧。”^[28]

回头来看，我们可以说，就人头税所作的道歉标志着华裔新西兰人作为这个国家完全成员的到来。他们已经准备好分享公平的阳光和真正平等的待遇。尽管总是有一些人不把华人看作新西兰人，但越来越多的华人已经开始争取他们的正当地位。

新老华人社团

从金矿时代以来, 华人就组织起同宗、同乡会以及大型的准政治组织以相互支持。世道艰难时, 这些社团借款给那些陷入贫困和患病的成员 (华人不能享受社会福利), 帮助他们返回中国。19 世纪的慈善团体 the Cheong Shing Tong, 致力于把客死当地的华人遗体 and 骸骨送回国内。因为大部分华人在新西兰没有家庭, 社团每年还会为死者扫墓。

最近几十年来, 新移民也建立了大量的社团。其中许多是按照来源地组织的。一些则是职业团体, 比如华人医师协会、华人工程师协会和华人作家协会。^[29] 这些社团反映了特定时期华人群体的需要。最近几十年, 许多新西兰华人加入了扶轮社、狮子会以及各类体育俱乐部等。他们更愿意和新西兰人进行社会交往, 而不只是局限在自己的同胞圈子里。这些当然有赖于他们新树立的自信心以及与非华人打交道时的坦然, 更不用说还有他们流利的英语。

分化的人口

如今, 华人社区由于语言和方言的差异而

分化为不同的群体。他们来自不同政治制度下的不同国家和地区。许多当地出生的年轻一代华人, 正努力和自己的文化之根建立联系。有些人学习汉语, 有些人去中国旅行。最新的移民则建立华文学校, 让自己的孩子保持原有的语言技能。而与此同时, 他们自己却要学习英语, 以获得入籍新西兰的资格。

与一个世纪前的第一代华人移民相反, 华人新移民大多富有学识, 能言善辩, 受过良好教育, 懂英语, 更不能容忍歧视待遇。他们渴望被承认, 愿意融入当地社会, 这促使他们积极参与慈善和政治活动。

今天, 华人父母对孩子的职业选择要泰然得多。在 20 世纪 60 年代, 年轻人被鼓励进入“安全的”职业, 成为医生、律师、工程师、建筑师。但是, 21 世纪已经出现了年轻的华人艺术家、作家、音乐家和诗人。

对于很多非华裔新西兰人来说, 无论是吃中式点心、学习太极拳, 还是在中国新年期间观看舞狮表演, 和当地华人的交往通常是他们的首次亚洲经验。然而, 活力十足的当地华人文化的出现, 毕竟还是一个相对新鲜的事物。

[注释]

- [1] Manying Ip, *Aliens at My Table: Asians as New Zealanders See Them*, Auckland: Penguin Books, 2005.
- [2] J. Phillips, *History of Immigration*, Te Ara the Encyclopedia of New Zealand, Wellington: Internal Affairs, New Zealand, 2007.
- [3] B. Yee, “Coping with Insecurity: Everyday Experiences of Chinese New Zealanders,” M Ip, *Unfolding History, Evolving Identity*,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15– 235.
- [4] M. McKinnon, *Immigrants and Citizens: New Zealanders and Asian Immigration in Historical Context*, Wellington: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1996.
- [5] T. Boyer, “Problems in Paradise: Taiwanese Immigrants to Auckland, New Zealand”, *Asia Pacific Viewpoints* 37 (1), 1996, pp. 59– 79; J. M. Ligard, “East Asian Migration to Aotearoa/ New Zealand: Perspectives of Some New Arrivals”, Population Studies Centre Discussion Paper No. 12, Hamilton: Waikato University, 1996, p. 12; E. H. a. R. Bedford, “Immigration Policy Changes in 1998: A Comment”, *New Zealand Population Review*, 1998, No. 24, pp. 119 – 134.
- [6] M. Chapple, “The Wok Ethic”, *Metro*, No. 136, 1992, pp. 90 – 98; P. Booth, “Inv – Asian”, *Suburban Newspapers*, Auckland, 1993.
- [7] S. Brawley, *The White Peril : Foreign Relations and Asian Immigration to Australasia and North America, 1919 – 1978*, Sydney: UNSW Press, 1995.
- [8] J. Ng, *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 Dunedin: Otago Heritage Books, 1993; M. Ip, “Chinese New Zealanders: Old Settlers and New Immigrants”, in S. W. Gref (eds),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New Zealand: One People, Two Peoples, Many Peoples?* Palmerston North: Dunmore Press, 1995, pp. 161– 199.

- [9] N. Murphy, "The Poll tax in New Zealand: A Research Paper", New Zealand Chinese Association, 1994.
- [10] M. Ip, *Dragons on the Long White Cloud: the Making of Chinese New Zealanders*, Auckland: Tandem Press, 1996.
- [11] K. Burke, *Review of Immigration Policy August 1986*, Wellington: Government Printer, 1986.
- [12] J. Poot, G. Nana and B. Philpot,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the New Zealand Economy*,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 [13] J. Phillips, *History of Immigration*, Te Ara the Encyclopedia of New Zealand, Wellington: Internal Affairs, New Zealand, 2007.
- [14] R. Skeldon, *Reluctant Exiles? 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and the New Overseas Chinese*, New York: M E Sharpe, 1994; E. Ho, Manying Ip and R. Bedford, "Transnational Hong Kong Chinese Families in the 1990s", *New Zealand Journal of Geography*, April 2001, pp. 24– 30.
- [15] A. Henderson, "Untapped Talents: Employment and Settlement Experiences of Skilled Chinese in New Zealand", M. Ip (eds), *Unfolding History, Evolving Identity*,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41– 164; M. Ip, "Seeking the Last Utopia: the Taiwanese in New Zealand", M. Ip (eds), *Unfolding History, Evolving Identity: 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185– 210.
- [16] A. Henderson, "The Settlement of Skilled Chinese Immigration in New Zealand: Issu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Socio-economic Integration", *Sociology*, Palmerston North: Massey University, 2002, p. 700.
- [17] A. -M. Masgoret, *Employment Agencies Practice Are Asians Disadvantaged?*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2004.
- [18] B. R. a. R. Cremer, *Tigers in New Zealand? The Role of Asian Investment in the Economy*, Wellington: 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1996; M. I. a. W. Friesen, "New Chinese New Zealanders: Profile of a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in Auckland", *Aotearoa New Zealand Migration Research Network Research Papers*, No. 3, 1997, pp. 3– 19.
- [19] E. Ho, Jacqueline Lidgard, Richard Bedford and Paul Spoonley, "East Asian Migrants in New Zealand: Adaptation and Employment", *New Zealand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 Digest and Bibliography*, No. 3, T. A. D. P. Spoonley. Palmerston North: Massey University, 1997, pp. 42– 59; M. I. a. W. Friesen, "New Chinese New Zealanders: Profile of a Transnational Community in Auckland", *Aotearoa New Zealand Migration Research Network Research Papers*, No. 3, 1997, pp. 3– 19.
- [20] M. Ip, "Chinese New Zealanders: Old Settlers and New Immigrants", in S. W. Greif (eds), *Immigr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New Zealand: One People, Two Peoples, Many Peoples?* Palmerston North: Dunmore Press, 1995, pp. 161– 199.
- [21] M. Ip, "Maori Chinese Encounters: Indigenous immigrant Interaction in New Zealand", *Asian Pacific Review* 27, June 2003, pp. 227– 252; M. Ip, *Being Maori-Chinese: Mixed Identities*,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22] NZIS, *Astronaut Families and Cosmonaut Couples*, Wellington: New Zealand Immigration Service Research Report, 2000.
- [23] L. Shum, "Remembering Chinatown: Haining Street of Wellington", in M. Ip (eds), *Unfolding History, Evolving Identity*,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73– 93.
- [24] N. B. Fong, *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 A Study in Assimilat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59.
- [25] *New Zealand Spectator*, 25 June 1853, p. 3.
- [26] J. Leckie, "In Defence of Race and Empire: The White New Zealand League at Pukekohe", *New Zealand Journal of History*, 1985, 19 (No. 2): 103– 129; N. R. Murphy, *A Guide to Laws and Policies Relating to 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 1871 – 1996*. Wellington: New Zealand Chinese Association Inc, 1997.
- [27] NZIS, *New Zealand Immigration Policy and Trends*, Wellington: New Zealand Immigration Service, 1997.
- [28] G. Wong, "Is Saying Sorry Enough?" in M. Ip (eds), *Unfolding History, Evolving Identity*,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258– 279.
- [29] O. Martell,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New Zealand 1860's present", *Asian Languages & Literatures*, Auckland: Auckland University, 1998, 140 leaves.